



評論
t

打造「全球調解之都」金名片 拓展全球爭議解決新空間

青平

2026年10月20日，全球首個專門以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國際法律組織——國際調解院，迎來正式成立一周年。歷時一年耕耘，這座由舊灣仔警署活化改建的總部大樓，已從一個歷史文化地標蛻變為全球爭端解決新座標。隨着香港首個五年規劃落地實施，香港法律服務業錨定建設「全球調解之都」這一全新目標，正開啟從「亞太區中心」邁向「世界級樞紐」的戰略躍升。

國際調解院交出亮眼成績單，證明「調解可行、香港有為」

調解「朋友圈」快速擴容，彰顯日益深厚的國際認同。一年間，《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簽署及加入國從37個增至48個，締約國從8個增至18個。新增成員中相當部分來自亞非拉發展中國家，說明調解這一「非對抗」路徑，對長期在國際爭端解決體系中處於弱勢的一方具有真實吸引力。國際社會愈發清晰地看

到，訴訟程序漫長、成本高昂；仲裁雖靈活卻仍要分出對錯，往往贏了官司、斷了合作；對話協商、互利共贏，正成為普遍期盼。

案件辦理取得實績，充分檢驗機制運行效能。國際調解院成立僅半年便成功辦結首宗跨境海事租船爭議。該案當事方分別為中國與新加坡企業，牽涉船東、租船人與貨主等多個主體，權責關係交錯，如循傳統訴訟或仲裁路徑，必將損耗巨額成本、拉長爭議周期。該院實質性調解會議僅用一天，便促成全鏈條主體達成書面和解協議，實現多方共贏，生動展現了調解靈活、高效、低成本、重合作的獨特價值。更值得注意的是，涉案一方新加坡並非公約簽署國，調解院仍依規受理，彰顯了其把調解打造為全球公共法律服務的理念和信心。

制度建設蹄疾步穩，見證香港角色的迭代升級。國際調解院出台《國家間調解規則》《國際商業與投資調解規則》兩套

核心文本，填補政府間調解規則空白，香港由此完成從「法律服務提供者」到「國際規則共建者」的跨越。秘書長鄭若驊在多個場合強調，調解「不以判定誰對誰錯為主要目標，核心是讓當事方自主掌控爭端解決的過程與結果。」這種東方智慧與普通法傳統的交融，正是香港作為調解之都的獨特競爭力所在。

系統布局協同發力，夯實「調解必行、香港當為」發展根基

國際調解院何以在香港落地生根？答案就在「背靠祖國、聯通世界」這八個字裏。背靠祖國，使香港能夠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國際調解院發揮作用的戰略部署；聯通世界，使香港能夠成為連接「和合共生」東方理念與契約至上普通法傳統的橋樑。然而，打造「全球調解之都」絕非一日之功。當前香港調解制度仍面臨專業資格認證分散、跨境執行機制缺位、社會認知度偏低等現實短板，必須系統施策、久久為功。

一是在書寫調解規則上持續發力。以國際調解院兩套核心規則為基點，推廣調解管轄、適用範圍、保密、執行等具普遍意義的制度規範。探索與旨在解決國際商事和解協議跨境執行的《新加坡調解公約》建立制度銜接，推進粵港澳三地調解示範規則和調解協議司法確認機制，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國際、區際調解規則體系。

二是在打造生態集群上持續發力。繼國際調解院之後，國際統一私法協會亞太地區聯絡辦公室將於今年11月舉行開幕典禮，這是該會成立百年來首個在羅馬總部以外設立的海外機構，必將進一步強化香港對接國際商事規則的能力。未來，依託正在籌建的國際法律事務大樓，香港可吸引更多國際法律組織、仲裁機構、爭議解決服務商集聚，把「單點優勢」做成「集群效應」。

三是在調解人才培養上持續發力。堅持調解作為非持牌活動、不設強制發牌，以保持行業開放與國際人才流入；同時兼

顧專業監管需要，完善以業界為主導的調解員資格認證和執業規範指引，培養通曉兩大法系、適應全球場景的複合型調解人才。

四是在涵養調解文化上持續發力。借助已提交立法會審議的《2026年調解（修訂）條例草案》等本地立法，理順調解程序，鼓勵更多市民以調解解決爭議，夯實調解的專業化、標準化、公信力根基。持續開展「香港調解周」品牌活動，推動社區調解、校園朋輩調解多點開花，讓柔性和解的理念浸潤社會、深入人心。

當今世界變亂交織，對話遠比對抗彌足珍貴。國際調解院在港落地生根，充分證明依託「一國兩制」獨特優勢，香港完全有條件、有責任、有能力肩負起建設「全球調解之都」的時代使命，推動調解從替代性爭議解決方式，逐漸轉變為國際社會優先選擇的爭端解決途徑，讓源自東方的調解智慧，成為完善全球治理、促進國際合作、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的重要法治力量。

「獎盃」再亮 也洗不白亂港首惡的罪責



吳英鵬

日前，歐洲議會部分政客與「新方向——歐洲改革基金會」以「瑪格麗特·戴卓爾獎」之名，將本年度該獎項頒予已被香港特區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反中亂港首惡分子黎智英，並將其包裝為「捍衛自由社會的新一代領導人」。此舉缺乏基本的法治常識，再次暴露部分西方勢力的雙重標準和政治操弄，本文將從三方面透視其本質。

對法治精神的嚴重踐踏

今年2月9日，香港高等法院經156天公開聆訊，在審查2220件證物、8萬餘頁文件、聽取14名控方證人證詞後，依法裁定黎智英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及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成立，判處監禁20年。判決書長達855頁，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程序公正。作為案件幕後主腦，黎智英精心策劃、長期推動相關罪行，部分行為甚至發生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法庭保障了其全部合法權利，辯方律師亦確認羈押期間待遇無任何投訴。香港法庭對黎定罪和判刑的裁決，經得起法治和歷史的考驗。

諷刺的是，這樣一個長期破壞香港繁榮穩定並被嚴謹司法程序認定的罪犯，竟被某些歐洲政客強行粉飾成所謂「自由鬥士」「民主烈士」。這是對法治的侮辱、對自由的歪曲。真正的自由

社會，首先必須建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礎之上，任何人不得因其政治立場或境外支持而享有法外特權。「鐵娘子獎」也好，「金娘子獎」也罷，都無法改變黎是罪犯的事實。

對中國內政的悍然干涉

「新方向」基金會及其背後的歐洲保守派與改革主義者黨團，以「捍衛自由社會」為名，行干涉別國內政之實。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部勢力無權指手畫腳。黎智英案的本質，是特區依法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行為的正義之舉，與所謂「新聞自由」「民主價值」無關。一些反華政客故意混淆視聽，把依法懲治犯罪包裝成「打壓異見」，其目的無非是為反中亂港勢力張目，繼續在香港問題上攪局。這種做法既違反《聯合國憲章》確立的不干涉內政原則，也與當今國際社會主流所倡導的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原則完全背道而馳。歷史早已證明，外部勢力對香港的干預，從來只會破壞穩定、損害港人福祉，而不會帶來真正的繁榮與安寧。

有關政客一邊高喊「自由」「人權」，一邊對自身國家存在的嚴重社會撕裂、移民危機、種族歧視、貧富懸殊等問題視而不見；一邊對其他地方依法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橫加指責，一邊卻對本國類似行為保持沉默甚至支持。他們把「人權手電筒」只照別人、不照自己，把「法治」變成可以隨意解讀的政治工具。如此「雙標」不

僅損害了其所屬國的道德信譽，也讓國際社會看清所謂「捍衛自由」不過是選擇性適用的政治話語。真正令人敬重的政治家，應當首先尊重各國主權與司法主權，而不是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人。

對歷史人物的肆意抹黑

在英國人眼裏，戴卓爾夫人以堅定捍衛國家利益、堅守法治與主權原則著稱。她以霹靂手段處理福克蘭群島問題，毫不妥協，但在香港問題上最終也只能承認現實，尊重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歷史必然。部分西方政客把一個因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家安全而被定罪的犯人，與戴卓爾夫人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為他塗脂抹粉、為干涉他國內政尋找道德外衣，這是對西方陣營歷史人物最大的自我抹黑。該等政客借用戴卓爾夫人的名義，實際上是在消費歷史、歪曲歷史。

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香港國安法律的實施，有效堵塞了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漏洞，力促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任何企圖通過外部施壓、政治操弄否定香港司法判決的行徑，都注定徒勞。奉勸有關政客與機構，停止以「自由」為名行干涉之實，停止把罪犯美化成英雄。歷史終將證明，真正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是對主權的尊重和對法治的堅守，絕非那些短視的政治表演。

立法會議員、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李繼亨

有話要說

近期，法國巴黎等多地爆發持續大規模騷亂，示威者焚燒車輛、洗劫商舖、攻擊公共機構；意大利米蘭等地亦相繼陷入暴力漩渦。火光冲天之下，歐洲政客昔日掛在嘴邊的「民主抗爭」「美麗風景線」說辭，忽然集體失聲。同一套暴力行徑，發生在香港便是「民主自由」，發生在歐洲便成了「不可接受」；同一種止暴制亂，在香港被西方輿論口誅筆伐，在巴黎、米蘭卻被輕描淡寫。這種赤裸裸的雙重標準，恰恰是歐洲騷亂病灶的一面鏡子，照出了某些政客偽善的真面目。

雙標之一，在於對暴力的容忍程度。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期間，暴徒投擲汽油彈、縱火堵路、圍毆市民，西方政客與媒體將其形容為「爭取自由的抗爭」，甚至美化暴力。然而，當巴黎街頭的蒙面者點燃垃圾桶、砸碎櫥窗、向警察投擲燃燒物時，歐洲政客的措辭立刻變成了「不可接受的暴力」。法國內政部數據顯示，僅學生抗議浪潮中便有超過七百所學校受到衝擊，南特一所高中的玻璃入口和部分校區被大火燒毀，損失超過200萬歐元。意大利米蘭市中心周末騷亂中，約兩千名大多身穿黑衣的青少年襲擊商舖、破壞街道設施，僅零售業損失即達70萬歐元。同一種打砸搶燒，在香港是「抗爭」，在歐洲是「騷亂」；同一種蒙面縱火，在別國是「風景」，在本國是「犯罪」。這種選擇性定性，與其說是對「暴力」的判斷，不如說是對「暴力發生地」的判斷。

雙標之二，在於對警察執法武力的態度。香港警隊在修例風波中面對磚塊、鐵棍與汽油彈的攻擊，使用催淚彈、橡膠子彈等非致命武力驅散暴徒，西方輿論機構與政客齊聲譴責「過度武力」，要求「獨立調查」。然而輪到法國

警察面對本國騷亂時，情況截然不同。法國警方在學生抗議中動用催淚氣體、警棍及爭議性的防暴彈，一名15歲青年被閃光彈炸斷左手，一名14歲少年下頷骨兩處骨折、牙齒脫落。意大利政府更在米蘭騷亂後直接通過一攔子措施，擴大警方對未成年人的拘留權限，對蒙面行為加重處罰，對組織暴力示威者可判處4至12年監禁。試問，當香港警察依法制止暴徒時，那些高呼「人權」的歐洲議員在哪裏？當法國警察的防暴彈打碎少年下巴時，那些要求「克制」的聲音又在哪裏？同樣的警棍與催淚彈，落在香港暴徒身上是「鎮壓」，落在巴黎示威者身上就成了「維護秩序」。

雙標之三，在於對宵禁及出動軍警的立場。2019年黑暴肆虐，香港僅依靠警察維持秩序，卻被西方政客斥為「警察國家」。而意大利政府在米蘭騷亂後，決定向米蘭派遣五百名軍人增援，法國也已出動「憲兵隊」及軍用裝甲車執法，更別說數以萬計的警察。法國在部分地區實行嚴格宵禁，無人敢上街。對於維持秩序的行動，在香港是「升級鎮壓」，在米蘭是「維護法律秩序」；歐洲可以肆意宵禁與拘捕，自稱是「必要措施」，在外國就是「專制手段」。這種雙標已經超越了虛偽，近乎政治上的精神分裂。

說到底，歐洲騷亂是一面「照妖鏡」。它照出了某些政口中「普世價值」的真實面目。其口中的自由、人權與法治，不過是合則用、不合則棄的工具。當暴力發生在別人家的街頭，他們稱之為「風景線」；當火焰燒到自家門口，他們立刻動用軍隊、裝甲車與緊急法令。香港的由亂到治已由事實證明，而巴黎與米蘭的火光仍在拷問：一個連自家街頭都管不好、連同一把尺子都不敢用的歐洲，還有什麼資格對香港事務指指點點？

長征歷史中的香港角色和作用



王江

長征的勝利，是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2026年是長征勝利90周年，回望這段歷史，香港雖遠離紅軍長征路線，卻同長征有着多方面的聯繫。一些長征參加者曾在香港工人運動中接受鍛鍊；長征前後的秘密聯絡、接應和團結抗日活動，也曾在這裏展開。認識這些聯繫，需要把香港放回中國近代變革的歷史進程。長征時期，中國革命既面臨軍事上的生存考驗，也需要保持組織聯繫，爭取更廣泛的社會支持。身處殖民統治之下的香港，以自身的社會條件參與了這一進程。工人走入革命隊伍，地下工作者維繫城市與根據地的往來，旅港愛國人士和報刊工作者推動團結抗日。香港與長征的聯繫，正是在這些具體行動中形成的。

從香港工人運動走向長征

在香港工人運動的發展中，勞動者對自身處境的認識，同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要求逐步聯繫起來。1922年香港海員大罷工、1925年至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特別是省港大罷工，將香港與廣州兩地的群眾鬥爭聯繫起來，一批工人在罷工和工會工作中接受鍛鍊，進而投身革命。後來參加長征的陳慧清、黃甦、鄧發，都有這樣的經歷。他們在工人運動中接受鍛鍊，在中共組織的培養和革命實踐中逐步成長為革命幹部，繼而走入長征隊伍。香港工人運動為中國革命培養的骨幹，在新的環境中繼

續承擔各自的工作，也把這座城市同長征的歷史聯繫起來。

隱蔽戰線上的聯絡與接應

中央紅軍出發長征之前，香港已經是中央蘇區對外聯繫的重要節點。1930年代初逐步建立的中央秘密交通線，將上海、香港、汕頭、大埔和閩西等地連接起來，進而通向中央蘇區，承擔人員轉送、文件傳遞和物資運輸任務。食鹽、紙張、藥品和無線電通信器材等，也經由這條線路進入根據地。從上海前往江西，先經香港再輾轉內地，地圖上的距離並不近。這樣的路線選擇，服從於當時鬥爭的實際需要。哪裏能夠避開封鎖，哪裏有交通條件和可靠接應，決定了人員與物資能否抵達。香港的航運和商業往來，為秘密交通提供了中轉條件。粵東、閩西的交通站和護送人員，則承擔了後續銜接。各地分工配合，才使這條線路得以運行。

長征開始後，中央機關和紅軍主力持續轉移，中共的聯絡任務隨之調整。1935年，潘漢年離開長征隊伍，承擔恢復地下組織等任務，輾轉香港、上海等地。因上海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工作一時難以開展，他又返回香港，隨後赴蘇聯。在紅軍進行軍事轉移的同時，中共中央還須設法恢復同城市地下組織及共產國際的聯繫。香港所提供的停留、轉移和接洽空間，在此時具有實際作用。1936年，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幹部前往上海、廣州、香港等地開展組織恢復工作。同年9月，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在香港

成立。同年12月，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設立工作委員會。此前受到破壞的組織聯繫逐步恢復，也為隨後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創造了條件。

紅軍主力在內陸突破圍堵，城市地下組織在嚴酷環境中堅持工作。重建受到破壞的組織、恢復中斷的聯繫，是中共在這一時期的重要任務。香港的聯絡與接應，體現了長征前後中國革命在隱蔽戰線上的持續努力。

團結抗日中的政治交往

長征前後，中國革命面臨的另一重大課題，是在民族危機加深的背景下，爭取更加廣泛的抗日力量。香港聚集的一些愛國人士，具有不同的政治經歷，也保有同內地各方面的聯繫。他們圍繞國家出路展開的活動，使香港成為政治接觸和救亡討論的重要場所。

蔣光鼐、蔡廷鍇領導的十九路軍，曾在1932年淞滬抗戰中奮起抵抗日軍。1933年，他們同李濟深、陳銘樞等人發動抗日反蔣的福建事變。事變失敗後，相關人士轉赴香港，繼續尋求救國道路。此前同紅軍的接觸，為後續交往留下了基礎。

據李以助的回憶，1935年春，蔣光鼐與蔡廷鍇商議，從十九路軍公積金中拿出十萬銀圓，在香港交給中共代表潘漢年，以援助已經開始長征的紅軍。1935年7月，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在香港成立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主張聯合各黨派一致抗日。旅居香港期間，這些人士繼續利用原有的社會關係，聯絡不同方面

的力量，尋求聯合救國的辦法。

民族危機日益深重，抗日救亡成為凝聚各方愛國力量的重要基礎。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分析國內階級關係的新變化，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此前在香港發生的接觸與援助，表明政治主張和歷史經歷不同的人士，能夠在共同抗日的目標下尋求合作。香港匯聚各方人士，社會聯繫廣泛，為中共聯絡愛國力量、推動團結抗日提供了條件。

救亡報刊中的思想交流

隨着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進步報刊在香港的出版，為團結抗日主張的傳播提供了渠道。1936年6月7日，鄒韜奮在香港創辦《生活日報》，以促進民族解放、推廣大眾文化為辦報宗旨。當時中央紅軍已經到達陝北，紅軍其他主力仍在長征途中，抗日救亡運動不斷發展。在報紙創刊前，劉少奇以「莫文華」為筆名致信鄒韜奮，闡述關於民族解放和人民陣線的意見。同年7月底，《生活日報》刊登鄒韜奮、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聯名的《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不同方面的救國主張，在香港出版的報紙上相互回應。

圍繞如何擴大抗日力量、推動共同行動，劉少奇與鄒韜奮等人的論述各有側重。通過在香港出版的報刊，這些主張進入公共討論，也使不同地區的讀者能夠了解團結抗日的意見。紅軍長征後期，香港既為各方人士開展接觸提供了場所，也為救亡主張的交流提供了傳播渠道。

在國家歷史中理解香港

香港與長征的聯繫，展現了中國革命廣泛的地域基礎和社會基礎。農村革命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堅持鬥爭的重要依託，城市工人運動、地下組織和進步文化活動，也為革命事業提供了支持。殖民統治造成的分隔，沒有割斷香港同內地的人員往來和社會聯繫。革命者和愛國人士依託這些聯繫開展工作，使香港參與了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

這些參與者中，有在香港出生、成長的勞動者，也有因革命工作或救亡活動而來到香港的人士。他們與這座城市的關係各不相同，卻都以具體行動把個人命運同國家前途聯繫起來。工人運動中的鍛鍊、秘密交通中的接應、愛國將領的援助、報人的救亡宣傳，構成了香港愛國傳統的重要內容。香港的作用，也體現在為不同地區、不同經歷的人士提供了相互聯繫、共同奮鬥的條件。

今天，香港已經回歸祖國，在「一國兩制」下保持自身特色和對外聯繫。重溫這段歷史，更能理解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對於香港命運的深遠意義。紀念長征勝利90周年，銘記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偉大歷史功績，也應正視香港革命者和愛國人士留下的精神財富。那些從香港走入長征隊伍的人，那些為聯絡接應、團結抗日而奔走的人，以各自的努力參與了中國革命。他們留下的歷史足跡，見證着香港同祖國命運相連的深厚聯繫。

浙江師範大學邊疆研究院副院長